

恭城瑶族自治县传统祠堂柱础探析

Research on the Column Bases of Ancestral Halls in Gongcheng Yao Autonomous County

李震 Li Zhen
谢小英 Xie Xiaoying

内容摘要:恭城县传统祠堂柱础类型丰富、形态多样,体现了汉族建筑文化与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交融,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文通过对恭城祠堂柱础的类型、空间位置、纹饰进行深入分析,总结了恭城柱础的形态规律和地域规律。这有助于地方性传统建筑形制理论的构建。

关键词:恭城、祠堂、柱础、地域文化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1.022

恭城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地介五岭之间峰峦回合”^[1],以跨县境北面及东面都庞岭山脉的隘口龙虎关与湘南江永县交界。恭城河经江永西折纵向贯通县境,南下至平乐注入西江支流桂江,境内水系密布。恭城为多民族杂居格局,主要有瑶族、汉族、壮族。瑶族自唐代开始从湖南、广东、江西等地陆续迁入,壮族由宜山、南丹等

地迁入,汉族建县前已有部分从中原迁入,多数系明、清时期由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任官、流寓、逃荒、经商和从事手工艺谋生迁入。^[2]恭城少数民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认同且吸纳汉文化。清光绪年间瑶族已“尽皆纳税,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而壮族“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义,游庠食饩”^[3]。族谱碑刻等资料亦表明少数民族如汉族一般建立祠堂敬宗收族,祠堂逐渐成为族内公共活动最频繁的建筑,规模、尺度、结构、装饰无不倾各民族之全力精心打造。其中作为建筑构件之一的柱础兼具辅助传力、托垫隔湿的实用功能与艺术内涵,设计意匠的研究价值是比较高的。现恭城遗存最早的祠堂为清中期建造。笔者对从此年代开始至“民国”八年间修建的29座传统祠堂进行了调研,17座为汉族祠堂,12座为少数民族祠堂,其中瑶族祠堂9座,壮族祠堂3座,祠堂柱础均为石制,无

木础、木榫。本文通过对调研祠堂柱础(檐柱及金柱柱础)的归类、空间位置、纹饰特征作一系列分析总结,以此为视角切入探讨移民背景下恭城不同文化汉族建筑间和汉族建筑与少数民族建筑间营造技艺的交流。

一、柱础的分类

1. 分类特点

柱础依造型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A型上下收束三段式、B型八边形三段式、C型两段式以及D型一段式。其中B型最为盛行,数量上呈绝对优势,C型次之,A、D型则数量均等。(表1)

A型上下收束三段式柱础,是所有类型中最高的,础头、础身、础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塑形,柱础上下都向内收,为汉族与瑶族所用。A型柱础之收束特征、以分层处把柱础区隔为较明显的三段的形态特征,与广府地区清代尤其清中后期最兴盛的束腰柱础一致^[4-5],加之现存于恭城文庙内的《重修粤东会馆碑记》碑刻记述“我粤馆溯自乾隆”^[6],表明至迟清早期时,粤商势力在恭城已成规模,具有广府建筑风格的粤东会馆已经存在。因具备广府束腰柱础传播的条件,可判断A型柱础源于广府束腰柱础。使用者除广东籍移民外,还有福建籍、湖南籍移民。此型分为三类:a类8例,分层较多,柱础中段为四面体或八面体且超过半数向外叠加扩展1~3层,收束处径宽相等,收束径宽和柱径的最小比值约等于0.64,收束程度相较于广府地区小了不少。若柱础中段是四方体,则四方体的高宽比较广西绝大多数同类柱础要大得多(图1),余下的柱础中段形态暂无对比案例,为恭城独有。b类7例,集中分布于恭城镇,更接近瓶形,分层少,强调弯曲意态。“瓶”与平安的“平”谐音,表达了当地人民对平和安定生活的希冀。此类柱础中段除一例是上下内凹中间鼓凸的四面曲边体,富有一定对称感。b类这种曲边体样式在广府地区及广西其他地区目前没有同类,广西最类似的案例在三江。(图2)有意

表1. 柱础分类示意(各类型各时期的不完全列举)

A	a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同治元年1862 清后期,同治五年1866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a		清中期,道光六年1826 清中期,道光十二年1832 清后期,同治五年1866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b		清中期,道光六年1826 清中期,道光十二年1832 清后期,同治五年1866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b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同治五年1866 清末 民国六年1917	
	c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c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后期,光绪四年1878 清后期,光绪十一年1885 民国六年1917	
C	a		清道光前 清后期	D	a		清道光前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咸丰八年1858 清后期,同治八年1869
	b		清中期,道光六年1826 清后期,同治年间 清后期,光绪四年1878		b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光绪三十二年1906
	c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中期,道光二十年1832 清中期,道光二十六年1846		柱础分部示意		表1
	d		清中期,道光十八年1838 清后期,同治年间				
	e		清后期,光绪八年1882 清后期,光绪十九年1893 清后期,光绪八年1882				

思的是,广西广府束腰柱础中段为四面曲边体的占比极大,其中上凸出下内凹的上大下小形状最多,也广泛见于广府地区,恭城镇的官式建筑亦有出现(图3),但恭城民间祠堂中没有相同的形式。c类是上部b类下部a类的组合形式,仅一例,造型层次最多。以上各例,说明了广府束腰柱础自广东进入广西后,结合各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继续分化,恭城传统祠堂的A型柱础既有继承又有所创新。

B型八边形三段式柱础础座为方形,础身八边形,础头由柱与础间的横演化而来,与其石碾石础分开制作,不如合一造型既省料省时,又使柱下更规整。虽同为三段式,A型各段的处理终是为某种形态的统一,而B型的处理则更凸显各段的独立性,取得一种微妙的互补感。八边形三段式柱础是湖南传统建筑常见的一种柱础类^[7-8],可装饰面较多而不同角度视觉上又很匀称。恭城“地邻衡永风声气尚相类”^[9],自是广为风靡。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广西传统祠堂此类柱础集中分布于毗邻湖南的桂东北地区,向西延伸至桂中北部的柳州也为数众多,再往南到桂中中部来宾的东部,甚至桂东南地区玉林的西北部亦能见到不少,玉林的还会在上方再加榫。(图4)恭城这类柱础础头有一类酷似《营造法式》规定的榫的形状,六例钵形,其他为鼓形。恭城这种上凸下斜收的钵形础头(图5)为本地独有,另外很多鼓形础头则比桂北的更高更圆实,甚至有一例础头高度两倍于础身(图6)。恭城各籍汉族移民的祠堂均有使用B型柱础,且柱础个数比例上汉族占2/3,少数民族占1/3。个别平地瑶祠堂中的八边形三段式柱础甚至比许多汉族祠堂中的更复杂,而反观过山瑶则因经济拮据,柱础做工粗糙。(图7)细分下来,恭城B型柱础有三个小类。a类共34例,由础头、八面柱体础身、础座构成,础身底部无突角状体。柱础宽高比除一例为0.56外,范围在0.76至1.33之间,且多数近1,不似全州和富川同类柱础中宽高比有达到1.5左右的(图8)。b类5例,鼓形础头,础身收腰分为上下两段,层次多一点,上段是主体,形状为八面柱体或八面瓜棱体或介于两者之间的八面弧边体,下段短八面柱体对上段起到承托作用,如上段的支座一般。柱础宽高比基本稍大于1,恭城以外仅灌阳、兴安、富川的祠堂有出现,灌阳与富川还与恭城交界,不过富川的整体比例与恭城的最相似,灌阳的一些础身下段体量明显增大,加强了造型的稳重感(图9)。c类19例,由础头、八面柱体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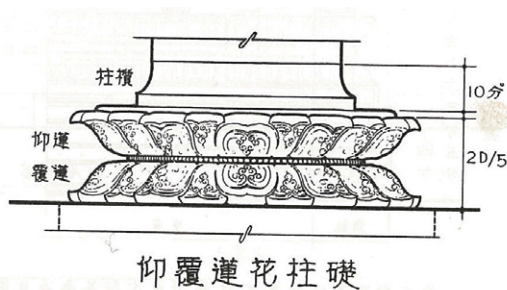
1. 广西绝大多数同A型a类的柱础中段四方体高宽比较小 2. 三江县南寨村谭氏宗祠天井廊柱柱础 3. 恭城文庙柱础
4. 部分玉林祠堂的八边形三段式柱础上会出现榫 5. 钵形础头的B型柱础 6. 秀游村周氏宗祠寝堂前金柱础
7. 俸头寨村俸氏宗祠寝堂前檐柱础 8. 全州同B型a类的柱础

础座构成,础身底部础座顶面四角间有突角状体,是恭城少数民族最喜欢用的B型柱础。c类中形体偏长的柱础数量是三小类里最多的,柱础宽高比值在0.55~0.66间的就有四例,而柱础的突角状体通常体态上较为拔高。a类与c类也是广西祠堂八边形三段式柱础里被用得最多的类型,宽高比波动幅度大,出现了最多长形的造型,恭城的情况即是一种反映。结合此前调研,笔者还发现柳州柳南区客家祠堂的这两类柱础是最瘦长的。a类与c类部分柱础础头与础身之间的做法有垫托础头的意向,一种是八面体棱边直接向上延伸做出头,一种是从八面体上对位棱边的位置做出头。出头有笏头、如意头、类如意头、类寿桃头、叶头,广西其他一些祠堂里同类柱础中的出头还有瓶形和葫芦形的,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祈愿。此外,广西八边形三段式柱础还有一种应用较多的样式是恭城没有的,即础身是上小下大的八面台状体,台状体通过雕刻做出分层以增加不同装饰空间,装饰效果丰富。(图10)总体来说,恭城B型柱础与周边地区的既有内在联系的相似性,又不失地方背景下的独特性。

C型两段式柱础由础身与础座构成,最为少数民族所喜,形态多样随意性大,但朴素基本无纹饰。此型包括五个小类,变化主要在础身。a类础身源于榫的意象,础座八边形,整体较矮,仅两例,说明类榫形与八边形结合的柱础B型是当时综合各因素得出的主流形式,完全取代a类。a类外的小类础座为方形。b类数量最多,础身

内凹,最小础径在础身,除两例础身底面呈圆形与圆角方形外,其他八例础身底部均由础座顶面四边向上推起而成,手法类似古镜与柱顶石边缘的交接处理。古镜柱础原普遍用于明都南京的官式建筑,后随永乐迁都而将其样式带到北京,几乎成为明、清官式建筑柱础的唯一风格^[10]。这种形制可能由明朝南下而来的守边官军传入恭城,经年累月发展出了地方性特色做法。b类均出现在少数民族祠堂,由于瑶族文化在恭城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笔者推测b类础身曲状收束的态势与瑶族长鼓束腰的形状(图11)有关。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指出“瑶人之乐,有庐沙、铙鼓……铙鼓即长大腰鼓也”。铙鼓即长鼓,是瑶族祭祀或节庆时用的乐器。明洪武年间,湖南千家峒一支移居瑶民将吹笙拊鼓(长鼓)的风俗带入恭城,不断流传之后遍及全县。^[11]光绪《平乐府志》亦记载恭城瑶族“丧娶用长鼓,以手击之”^[12]。长鼓在日常生活反复被使用的过程中,加深了人们对束腰造型的熟悉度、接受度、选择度。c类3例,础身底部外凸隆起,底面类圆形,显敦实厚润。d类础身多边形,4例,有四边形与八边形,制作容易便捷。e类6例,础身整体略微外隆,底部有突角。

D型一段式柱础像垫块一样,一体成型,没有础身础座之分。这型柱础绝大多数也是出现在少数民族祠堂。柱础宽高比基本都大于2,最甚者宽高比达到了10,仅仅为了把立柱与地面稍作区隔,不让水汽直接与立柱接触,并没有在外观方



9. 灌阳同B型b类的柱础 10. 础身为上小下大八面台状体的八边形三段式柱础 11. 瑶族长鼓 12. 《营造法式》规定的枋形制

12

面作什么考虑。不过D型柱础是四个大型里数量最少的,说明在彰显家族气势、聚集族人的祠堂中,人们还是尽可能兼顾柱础的功能作用与视觉上形态上的多样化、艺术化,来和建筑的重要性相匹配。整体过于低矮的柱础防潮效果不及高的,又没多少工匠可以创作发挥的空间,不会有太多选择的可能。此型有两个小类:a类11例,横截面应为圆形,纵截面应为长方形,因做工关系形状不太标准,一些础身部分都有小幅度外欹;b类3例,础身内凹,底面径宽大于顶面径宽,造型接近《营造法式》规定的枋的上部(图12)。

2. 时间特点(表2)

从大类来看,B型时间跨度最广,清中期、清后期、民国初期均有,每个时期数量所占比例都最大且在递增,民国初期甚至是唯一的类型。C型在清中期、清后期数量所占比例仅次于B型,清中期尚能与B型平分秋色,并为主流柱础类型,清后期使用频率却缩减不少,数量比小于B型二分之一以上,使B型成为绝对的主流。A型虽在清中期、清后期出现数量都不多,但各时期比例上均匀,在15%上下。反观D型,清后期的数

量与清中期的相比由20%跳至9.9%,是下降幅度最大的类型。可以看出,清后期以来,造型简朴的C、D型逐渐被淘汰,复杂的三段式柱础则愈受欢迎,说明人们对美的定义更趋向繁复化了。

从大类中的各小类来看,A型a类出现最早,清中期时a类中段为四方体。b类出现比a类略晚一些,清中期时b类已有四面中部向外鼓凸的形态了,都在恭城镇。至清后期,b类四面中部延续向外鼓凸的特征,而这一时期a类早于b类或与b类同年间中段出现了四面鼓凸状体,也在恭城镇,应该是受了b类清中期时形态的影响。清后期a类中段还出现了八面体,可能是受B型造型的启发。c类在清后期时出现,仅一例,这种发展出的相叠的样式未成气候。B型三类清中期、清后期、民国初期均有分布,清中期与清后期a类数量最多,民国初期c类数量最多,各时期b类数量最少。清中期钵形础头在a类中出现,清后期直到光绪年间才在a类c类中复现。b类清中期时础身上段为八面柱体,清后期出现了八面瓜棱体,而到了民国初期棱边弧度又变小了,形成八面弧边体。清中期只有a类一例从八面体

上对位棱边的位置做出头,似垫托础头,清后期与民国初期三类础头础身间处理都更丰富了,部分继续使用清中期的手法,部分多加一层束圈,部分使用另一种表现托垫础头意象的手法,即八面体棱边直接向上延伸做出头。C型a、b、d三类在清中期至清后期都有出现,c类清中期道光后消失,但高度在此时期为C型中最高,e类出现在清后期的光绪年间。a、d类两个时期数量都很少且类内个体统一度低,b类或出于实际需要或吸收c类造型的宽高比经验,清后期时整体变高。少数民族在光绪八年(1882)后不再使用C型。D型清中期时开始出现。a类稍早于b类,清后期a类明显变矮且集中在同治前,等于宣告退出舞台。b类一例,在光绪年间,宽高比变小。由于b类为瑶族所用,总共只有3例,一是高度不及C型b类,二是前文论述的束腰感对恭城少数民族潜意识的影响,故恭城少数民族经过清中期的选择后,决定保留C型b类。

二、柱础的空间特点

1. 不同位置的柱础(表3)

前檐柱础主要为B型(22例)与A型(15例),个别用C型(3例)及D型(一例)。首先,A型基本上全部用于前檐柱下,B型中前檐柱础比例最大,达到了约38%,而这两个类型的柱础是恭城所有柱础中装饰功能最突出、做工最细致的。其次,前檐柱础雕刻纹样(不计联珠纹)的频率最高,纹样也最丰富。再次,前檐柱础的平均高度远大于其他立柱柱础,应是顾及与雨水接触的可能性和从视角上能更易吸引人们的注目。综上,前檐柱础在恭城所有立柱柱础里最受重视。人们未进入祠堂各堂前,与其距离最近且其不被遮挡,方便表现出宗族想要传达的东西,也是追求实用高效的思维在传统建筑艺术中的体现。

前金柱础多数为B型(17例),也有C型(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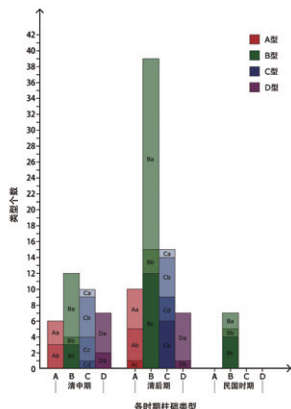


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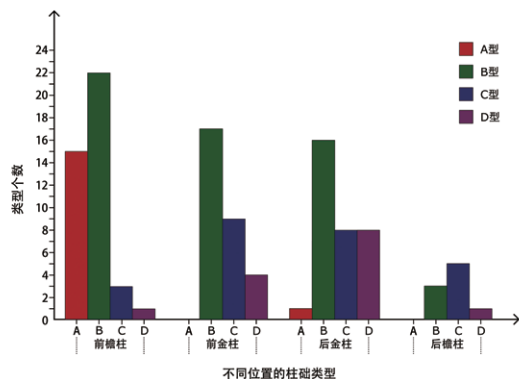


表3

表2. 柱础时间分布 表3. 柱础空间位置

例), D型(4例)最少。前金柱础比前檐柱础更多地使用C型与D型,造型更简。前金柱础雕刻纹样(不计联珠纹)的频率虽不及前檐柱础与后檐柱础,但纹样的复杂程度仅次于前檐柱础。前金柱础平均高度小于前檐柱础18厘米左右。

后金柱础多数为B型(16例),其余为C型(8例)与D型(8例),仅1例用A型。B型C型后金柱础与B型C型前金柱础数量差不多,而D型数量比起前金柱础的增加了。后金柱础雕刻纹样(不计联珠纹)的频率和纹样复杂程度与前金柱础类似,平均高度比前金柱础低3厘米。

后檐柱础基本为C型(5例)与B型(3例),仅1例用D型。后檐柱础所在的祠堂中约82%为少数民族祠堂,故B型退居次要地位,数量不如C型。后檐柱础纹样(不计联珠纹)不是简单线刻就是在非主要部位上,柱础的平均高度与前金柱础是持平的。

2. 祠堂中单体厅堂内常见的柱础组合

若组合为前檐柱础+前金柱础+后金柱础,大部分见于寝堂,主要出现下列五种情况:

(1) A型+B型+B型,6例,均为汉族所用,清中期1例,清后期5例,除个别例外,通常仅前檐柱础饰纹(不计联珠纹)。

(2) B型+B型+B型,6例,在清后期才出现,其中5例在汉族祠堂内,1例在少数民族祠堂内。三个柱础在高度、形式上基本没有变化,只有两例的前檐柱础较另外两个柱础纹样(不计联珠纹)多些。

(3) B型+C型+C型,3例,清中期两例,清后期1例。

(4) C型+C型+C型,两例,只出现在清后期。

(5) B型+D型+D型,两例,只出现在清中期。

后三种见于少数民族祠堂,少数民族祠堂的前檐柱仅用三段式柱础,前金柱础与后金柱础类型一致,高度极其接近或完全相等。

汉族祠堂的门堂半数以上仅设前檐柱础,则其前檐柱础大多不饰纹(不计联珠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A型,3例;一种是B型,5例,只出现在清后期。

门堂中还存在着一种仅用前檐柱础和后檐柱础、无金柱础的组合,这类组合共4例,均出现在少数民族祠堂的门堂中。前檐柱础用三段式,高出后檐柱础很多,3例A型,1例B型,A型都有纹样(不计联珠纹)。A型前檐柱础与B、C、D型后檐柱础各搭配一次,B型前檐柱础则与C型后檐柱础搭配一次。



13. “指日高升”纹样 14. 兵器纹样 15. “福”字象形纹样

三、柱础的纹饰特点

恭城传统祠堂柱础纹样雕刻技法有线雕、浮雕,浅浮雕使用频率最高,其相对经济而耗工较少又不失质感。透过纹样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地多种思想观念以及风尚的碰撞。

据县志记载,恭城瑶、壮、汉族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除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外,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较深。^[13]祠堂柱础纹样中有佛家“八吉祥”中的宝相花、海螺、宝伞纹,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的琵琶纹,与钵形础头结合的仰莲瓣纹,占了相当大比重的道家“暗八仙”纹。

恭城一向着重文教,各族人民都希望通过读书出仕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祠堂柱础出现了毛笔书卷(册)纹、谐音“侯”的猴纹、取左半边“甲”字寓意及第登科的鸭纹、表示能独占鳌头的鳌鱼纹、手拿书“指日高升”四字纸卷的人物纹(图13)用以明志。

恭城古时民间亦多习武强身,现栗木镇上大合村欧阳宗祠柱础保存着完整的兵器纹样(图14),表达了族人对武技、武境、武德的追求。

其他传统吉祥纹样有器物类的如犀角纹、如意纹,植物类的如牡丹花纹、莲花纹、卷草纹、柿蒂纹,动物类的如蝙蝠纹、狮子纹、耕牛纹,瑞兽类的如龙纹、凤纹、仙鹤纹、麒麟纹,组合类的如喜(喜鹊)上眉(梅花)梢纹、神鹿衔芝纹、龙凤呈祥纹、双凤朝阳纹、凤凰衔书/剑纹,还有由仙鹤与龙构成的“福”字象形纹(图15),设计感很强,匠心独运。纹样时间变化上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至清后期,代表帝王之家及权力至上的龙纹凤纹开始出现且较为常见,说明这一时期纹样的等级规制已完全放开了,封建政权接近尾声,官府对此也无法控制。

结语

恭城作为以瑶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明清

时期随着广西汉族移民浪潮的掀起持续接受汉文化的冲击,其建筑体系与格局在汉族建筑文化与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对话中不断构建发展。这体现在传统祠堂柱础上,一方面吸收了湖湘、广府柱础的源形式,深受汉族思想与工艺影响;另一方面保留了根植于瑶族文化本身的内容及少数民族思维模式,不断进行在地差异化演变。最终,柱础的类型、空间位置、纹饰均形成了自己的地域规律与特色。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西湘江—漓江—桂江流域传统建筑大木构架及谱系研究”(编号:51668004);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西桂江流域传统建筑形制及其保护研究”(编号:2015jjAA60093)。

图表来源:表1-3为自绘自制,图1-9、图13-15为自摄,图10来自网络,图11出自《梁思成全集第七卷》。

注释:

- [1]《恭城县志(卷4)》[Z],光绪刻本,第37页。
- [2]恭城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恭城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十七篇第一章第一节。
- [3]同[1],第44-45页。
- [4]陈丹,程建军:《广府传统建筑柱础之时间特征》[J],《南方建筑》,2017年第1期,第70-77页。
- [5]赖瑛:《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第216-225页。
- [6]刘志伟主编:《广西恭城碑刻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第80页。
- [7]柳肃主编:《湖南古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据书内插图归纳。
- [8]胡彬彬:《湘湖建筑(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据书内插图归纳。
- [9]同[1],第39页。
- [10]韩旭梅:《中国传统建筑柱础艺术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7,第12页。
- [11]马志伟:《恭城平地瑶吹笙鼓鼓的起源与变迁》[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1卷第1期,第22-25页。
- [12]《平乐府志(卷33)》[Z],光绪刻本,第9页。
- [13]同[2],第十七篇第七章。

李震/谢小英(通讯作者)
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